

# 论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国际关系内涵

吴 潮

**摘要：**作者通过对《战争论》的进一步解读，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内涵主要指的是近代时期开始形成并完善的国际关系体系。他的军事政治观的重要思想和贡献是，指出应通过均衡、协调、统一国际关系来制约人类基本行为之一的战争行为。

**关键词：**克劳塞维茨；政治观；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E0；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2-0034-06

**作者简介：**吴 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克劳塞维茨以《战争论》奠定了他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的同时，也成就了其世界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地位。然而，《战争论》中最为后人看重的并不是他关于战役、战例、战术问题的冗长而细致的阐述，而是他关于战争与政治之关系的精妙论述。正是他的军事政治观，开创了世界战争学说和军事哲学的一个新时代。

但是，尽管以往各种学派和学者对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已经作出了多角度的研究与理解，笔者仍然感到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尚有未能被完全认识或充分阐释的内涵——国际关系。笔者以下的分析和观点是希望在前人对《战争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解读与评析。因为这种解读与评析对当今核时代和后冷战时期仍然狼烟四起、战乱频频的世界，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 一、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国际关系内涵解读

克劳塞维茨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sup>①</sup>这个经典意义的论断构筑了其军事政治观的基石。但是，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思想索道将战争与政治予以连通？他所说的“政治”内涵包括了哪些内容？这是以往的《战争论》研究中鲜为涉及的，这也正是笔者在今天重新解读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出发点。

笔者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结论，是建筑在对“绝对战争”和“相对战争”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严谨的哲学思辨和缜密的逻辑推理之上的，这是一个精妙的推理过程。这个推理过程与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哲学渊源密不可分。克劳塞维茨在柏林军校学习期间，曾师从基维塞特教授——这是一位被公认的对解释康德学说颇有成就和见地、享有“市民哲学家”美称的大师。克劳塞维茨自军校毕业进入普鲁士上流社会

收稿日期：2002-11-20

① [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下同），第43页。

后，又时常与包括思想巨匠黑格尔在内的当时一批最卓越的精神世界代表人物在沙龙中聚会。因此，他的哲学基础与思辨力深受这些西方哲学泰斗级人物的影响。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的著名命题里，我们不难窥见到康德、黑格尔哲学理念的印痕。

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首先是从战争的“自然趋向”、“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sup>①</sup>起步，即战争按其自然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克劳塞维茨认为：从纯概念上讲，敌对双方在战争中对暴力的使用，由于相互作用的影响，在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之前，是决无止境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开篇即表述了“绝对战争”特征与表现形式的三种相互作用与三种极端：

其一，（从手段上看）战争是暴力行为，暴力的使用是无限度的，交战的每一方都迫使对方如自己一样使用暴力。由此产生第一种相互作用并导致第一种极端；

其二，（从目标上看）战争行为本身的终极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而欲达到此目标，必须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参战各方均如此。由此产生第二种相互作用并导致第二种极端；

其三，（从使用力量上看）为达到战争目的，不惜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以形成优势，双方形成竞争。由此产生第三种相互作用并导致第三种极端<sup>②</sup>。

为了表明这种“绝对战争”形态的发生仅是概念性的和哲学意义上的，克劳塞维茨特别列举了关于“绝对战争”的三个条件：

-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sup>③</sup>

由于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的出发点是一种纯概念的“绝对战争”，而不是历史上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战争，所以他的“绝对战争”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命题，并为此受到后人苛责，被称之为“对军事科学规律的性质问题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sup>④</sup>，“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sup>⑤</sup>。笔者以为，这些显得轻率的否定性评价不利于人们理解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行为内核的进一步分析。克劳塞维茨“绝对战争”观念的提出，恰恰是他在战争形态研究上的视角高于迄他为止的军事理论家、思想家之处，是他的军事政治观的出发点。实际上，在《战争论》未形成定稿的部分篇章里，克劳塞维茨特别指出了他创立“绝对战争”的理论“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sup>⑥</sup>。也就是说，他的哲学化的“绝对战争”命题的提出，其目的是确立评判事物的尺度标准。唯其有了绝对形态的战争观念，才可得出相对的概念，才为其分析评判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提供了价值取向。他的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精辟立论就是建立在由“绝对战争”到“现实战争”演变的总结与演绎基础之上的。

在对“绝对战争”进行论证之后，《战争论》中大量考察的是相对于其“绝对战争”概念的“现实战争”——即人类实际生活中的战争形态。克劳塞维茨认为，“现实战争”与“绝对战争”有着不同的运行轨迹和外在表现形式。例如：现实世界中“战争不是突然发生

①②③④ 《战争论》，第44、25-29、29、857页。

④ [苏] M·A·米尔施泰因等著：《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⑤ [英] J·F·C·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sup>①</sup>；作战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sup>②</sup>；“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sup>③</sup>。之所以如此，克劳塞维茨认为：“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sup>④</sup>，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摆脱把力量的使用推向极端的倾向，“绝对战争”发生的条件在现实中被修正了：“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sup>⑤</sup>，“它使战争具有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sup>⑥</sup>，而这才是人们所熟悉的现实战争。

对于战争的形态无法由其纯概念所决定，无法按照其原始逻辑轨道运行而发展为观念中的“绝对战争”的缘由，克劳塞维茨解释为是由于某种绝缘体的存在：“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sup>⑦</sup>；从这点出发，克劳塞维茨阐释了他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sup>⑧</sup>，“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必须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sup>⑨</sup>。

这便是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推导过程，从对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的立论出发，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从而构成其军事政治观的立论基础。但是克劳塞维茨对全部战史的理解以及他的《战争论》精义并未到此结束，或者说，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内涵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是有所不同或有所延展的。他在《战争论》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sup>⑩</sup>

这种并不属于战争本身的“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克劳塞维茨所极力关注与阐释的政治内容。他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早已存在于社会生活与国际关系之中，必须将目光引入此中。笔者注意到，为后人奉为圭臬的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经典性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其实是《战争论》中的一个小标题，他在标题之下正文中的完整阐述是：“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sup>⑪</sup>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未完成稿中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论述：“战争仅仅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政治交往引起的。……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sup>⑫</sup>他最终将这种交往定位为：“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sup>⑬</sup>既然克劳塞维茨一再强调“政治交往”，我们就不应该仅关注“政治”而忽视他在“政治”后所加的“交往”的涵义，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地触及其军事政治观的要义。有缘于此，笔者希望从下列两点上更宏观和更完整地把握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

其一，克劳塞维茨通过严密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的形态未能按其逻辑轨道发展而由“绝对战争”演变成了“现实战争”，是因为受到了被克劳塞维茨称为“政治”的绝缘体或摆脱力的影响；而他说的“政治”之内涵更多地指向为“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他认为战争产生于社会状态和国与国关系之中。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动战争谋求的是这两方面的功利和有利态势，其运用的程度与样式也将受到这些方面的制约，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决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战争论》，第30、31、32、32、30-31、855、855、856、895、25、45、894、135页。

限制和缓和”。

其二，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交往方式。不管人们多么地厌恶战争、憎恨战争，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只有充分认清这一点，才能有效地去制约它。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中国古代的先哲对此也有所认识。《论语》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sup>①</sup>孔子在 2000 多年前就认为治理国家、兴旺民族有赖于“足食、足兵、民信”，并认识到以“去兵”作为规范与制约人类行为的尺度了。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说明”中已经告诉读者，“或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sup>②</sup>。从《战争论》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力图根据正在形成中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传递出对战争走向与趋势的某种感悟。

## 二、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之国际关系内涵解读的现实意义

由以上论述可见，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之内涵相当复杂，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泛意义上的“政治”应该是有联系也有所区别的。这甚至使他遭到了一些指责：“由于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因而他不懂阶级斗争的观点，也不了解政治的深刻含义，终不能真正揭示出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sup>③</sup>“克劳塞维茨本人以及他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论点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就在于此。”<sup>④</sup>但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释名学之作，至于他所说的“政治”究竟是应该称为政治还是干脆叫人类行为方式或国际关系来得更直接为好，今天仍是可以讨论的。他在《战争论》中所推演和论述的，实际上是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战争行为，通过怎样的政治索道，在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下，为了何种的政治功利，以及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而缘起、发展，并应该如何制衡的。“社会状态与国与国的关系”，是他的军事政治观的基本立足点。而这个“国与国的关系”，正是当今渗透世界生活各个层面的国际关系体系。克劳塞维茨生活在 18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前期，正是世界的整体性日益显露，当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的时期。他在《战争论》中着力考察的是近代欧洲战争，特别是以拿破仑战争为代表的国际性、联盟化的战争。克劳塞维茨亲历了这场战争，尤其是 1812 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一役。当时克劳塞维茨投身俄军，进出于沙皇大本营、一系列高级指挥部和前线总参谋部，从前方到后方，他亲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经历了 1812 年战局，使他获得了倘若固定在一处可能永远也接触不到的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不仅充分观察到总的战略和各种形态的战争观的展现，而且了解了参战各方的不同立场。在 1812 年的战局中，克劳塞维茨直接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是“陶罗根协定”。他作为俄军的使者与被拿破仑裹胁一同侵俄的普鲁士军队谈判。他从政治与国际视角对军事形势作了具体分析，成功地促使普军与俄军签订了“陶罗根协定”。普军宣布与法军一刀两断，彻底摆脱了自耶拿战役失败之后逐步形成的对法国的屈辱依附关系。克劳塞维茨意识到在战争的帷幄里，俄普双方讲求的是一种国际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俄国人信赖同正在恢复自由的各国民众的亲密关系，他们的最大利益无非是摧毁普鲁士与法国的那种强制的结合，并为与普鲁士结成亲密同盟开辟道路。眼下，两军既非敌对者也非同盟者，它们在相互承认其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分手

① 《论语·颜渊第十一》，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266 页。

② 《战争论》，第 13 页。

③ 尚金锁：《马、恩、列、斯军事思想简论》，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5 页。

④ [苏] M·A·米尔施泰因等著：《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 页。

了”<sup>①</sup>。这种新的平衡与和谐的取得得益于“双方指挥官受理智和良心的支配，很快地达到了相互了解”<sup>②</sup>。可以说，克劳塞维茨亲身参与的“陶罗根协定”埋下了日后思维之果的种子——战争中似乎蕴藏着并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这对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敏锐而超时代性地觉察到了由于政治内涵日益社会化、国际化而带来的战争行为的升级及其在未来时代的功利所在。他在《战争论》中预言：“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sup>③</sup>如果我们把他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替换为“国际关系”，可以说简直就是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预告；也是 180 年前克劳塞维茨对国际关系不断发育成熟后人类现代化战争的英明预见。克劳塞维茨所处时代是当代意义上国际关系的诞生发轫期，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的不完备期、不稳定期，国际关系体系远不如今天这般规范与发达。尽管这使得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的内涵似乎不那么明晰与透彻，但他的目光毕竟超过了同时代人——他将战争行为纳入了国际关系和人类行为规范之中。人类为了自身繁衍和发展所采取的种种行为手段，在点燃起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己。对同类的恐惧与警戒从远古时代起就深深植根于人类心底。一切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是出于这种戒心而对人类自体实行的一种契约性保护与管束。种种经济秩序、政治关系的出现，也正是为了在弹性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政治行为加以规范。克劳塞维茨考察的是近代的战争，其立论却是向着未来的战争。战争行为方式由于其所具有的暴力残杀破坏的外在表现形式，必须加以制约，其出路在于强化国际关系网络。经济与政治交往的素质越高，活动能力越强，包容范围越广，战争行为的能力就越受到弱化。在国际关系尚不健全的核前时代，人类的功利心驱使战争行为被滥意施用，而克劳塞维茨预见到了战争行为和手段的无限扩大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应该如何制约的途径。他的英明预见及卓越的超时代性在国际关系充分发育的核时代无疑是有启迪和震聩作用的。

其二，虽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但由于后人对他说的“政治”内涵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此产生了异义。笔者以为从克劳塞维茨的“继续”之说并不能由此推绎出战争是政治的等同物，战争是革命的必由之途。克劳塞维茨将战争通过政治这个母体与人类行为联通，表明的也正是战争并不完全是政治的等同物这样一种观念，就像子女不完全是父母的等同物一样。战争作为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种继续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继续。战争脱胎于母体之后，在继续发挥和谋取母体功利性的同时，又具有了完全不同于母体的质的特殊的行为状态。这种状态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与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最大的区别是它的暴力性。战争行为是一柄双刃剑，既是经济、政治秩序的砍杀改造者，又是经济、政治生活的拱守卫护者。战争行为只是人类意欲实现自己目标所要采取的行为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是多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中的一条，而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一段必经之途。克劳塞维茨的祖国——德国历史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进入 20 世纪后，克劳塞维茨成为德国军界、政界所崇范的历史伟人。到 1918 年，《战争论》已被印行到第 13 版。然而，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巨澜的冲击下，由普德学派开端的对克劳塞维茨的研究已经偏航。这尤以鲁登道夫 1935 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为代表。他在书中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予以一种谬误性的发挥，从而得出：战争与政治都服务于保存人民生命的宗旨，而战争则是人民的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行为

①② [德] 克劳塞维茨：《1812 年的俄国战局》，转引自 [民主德国] 弗兰茨·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65 页。

③ 《战争论》，第 895 页。

作为政治行为的派生物，由于它的暴力性、破坏性，应使之受到制约。鲁登道夫则将之发展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形式，凌驾并控制了其他形式。这种反克劳塞维茨的总体战理论最终所表明的是全面战争成为一种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无法逃脱的命运，而和平则只是两次战争期间的备战时期。希特勒则将克劳塞维茨在普鲁士民族灾难深重之时所写的具有激烈民族奋争情绪的作品断章取义，以加强其大日耳曼主义的民族召唤力。总体战思想及其闪电战思想构成了纳粹德国军事理论的基础。笃信权威的德国人民懵懵懂懂走上歧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将德国化为灰烬，德国人并没有真正领会克劳塞维茨的教诲——他那早在《战争论》中闪光的思想：“为了明确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sup>①</sup>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政治观是既均衡、协调和统一全民族与国家利益，又均衡、协调和统一整个人类社会利益的这样一种思路。战争行为只能是在当这种均衡受到破坏，一切经济和政治行为手段都归于无效，利益的冲突必须要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用以创造新的均衡时方可使用。而如若将战争的暴力性予以极大的发挥，不顾一切后果地尽情利用和滥施，战争行为就将突破人类交往形式的行为规范和国际关系的容允度，为滥施者招来自身的毁灭。战败了的德国人在仔细品味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后感慨地表示：“德意志人只把他理解为军事著作家，用他取得了历次国家间战争的胜利，丢弃他或违背他打败了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他们未能深入到他的军事哲学的核心，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保住自己国家的统一，免遭彻底的失败。”<sup>②</sup>

既然战争是人类的交往行为的一种，因此，当要进行一场战争时，战争筹划者所关注的除了经济水准、军力对比等等物质条件外，更应将“人”这一因素放在中心地位来考察。尤其是敌手的民族心态乃至领袖的个性，都应在细析之列。这也是当代美国的惨痛教训之一：美国在当代所进行的两场大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带有极强的主体主观臆断性，机械而固执地从某种精神、某种道义、某种战略构想和某种责任感出发，而完全或几乎完全忽视了客体的“人”的行为能力与民族心态，从而陷入维谷，进退失据。历史的教训对于苏联解体后单边主义倾向抬头的美国来说，应该还是具有警醒作用的。

既然战争行为属于人类行为，完全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规范加以控制和改造。和平共处不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那种由相互确保摧毁来维系的共处，而应是通过完善行为规范，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共处。当代人类需要遵循一种共同的国际关系人道化准则。“人类在现代懂得的，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早已懂得了，这就是，在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公约，就不能彼此共处。”<sup>③</sup>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早已阐明，战争行为必须由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来决定、限制和缓和，而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主流中确立国际关系行为新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结构的意向之所在。只有这种发展方向才会使人类行为操纵下的世界具有稳定性与均衡性。

（责任编辑：李 申）

① 《战争论》，第864页。

② [德]威廉·冯·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7页。

③ [法]安德烈·博弗尔著：《明天的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